

近年日本有關汪兆銘及其 相關研究現狀評述（2000-2022）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on Wang Zhaoming and His Related Issues in Japan in Recent Years (2000-2022)

王晟旭（Wang Shengxu）*

一、緒 言

2023 年 3 月在香港上映了一部由香港籍演員梁朝偉攜一眾中國籍及日本籍演員出演的電影《無名》，這部電影以 1941 年後的「孤島」上海為故事背景，講述了在當時表面看起來風平浪靜的上海，其水面下卻上演著南京汪兆銘政權、日本軍部、重慶國民政府以及延安共產黨勢力之間互相角力的淒迷故事。同時，更饒有趣味的則是，在影片中有一幕則出現了汪兆銘本人的畫像。這也使人重新想起在那近一個世紀前的國事蝸蟻之際，所發生的一幕幕充滿了弔詭而又真實存在的歷史時光。

汪兆銘早期以刺殺攝政王成名，晚年卻又因同日本的關係而被世人唾棄。其故事迄今為止已逾半個世紀，但其頭上所被冠以的「漢奸」的帽子，卻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抑或政權的遞嬗被淡化，反倒近年來隨著民族主義的抬頭和國際關係的變化被不斷重提和強化。¹

誠然，從單一民族主義的角度來指控汪兆銘為「漢奸」的話，亦可謂無可厚非。但，由於汪研究的特殊性

和敏感性，導致許多研究學者退避三舍。這就導致了在相關領域仍有許多課題和疑問需要釐清。此外，從跨學科研究的角度，以及完善歷史的真實性來看，跳出以往的黑白二元認知結構，以更多元的角度和更多層次的分野，爬梳汪兆銘及其周邊的人或事的話，筆者認為將不啻於歷史分野，從文學、社會心理學再到當今人人注目的國際關係等學科，均有可能開闢出許多新的面向和可能。並且對於更大程度上還原那段歷史的真實相貌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筆者認為這也正是進行汪兆銘及其相關研究最主要的意義所在。

而恰好，日本作為中日戰爭爆發以及「汪兆銘工作」出現的始作俑者，不管是從史料的搜尋，當事人的採訪抑或是政治立場的考量等方面，對於推進汪兆銘及其相關研究的發展方面均有利好之處。

關於日本方面的相關先行研究，縱向來看：日本自汪兆銘在世之時便出現了對其個人的歷史和南京國民政府進行研究的專著。比如森田正夫《汪兆銘》、²中山樵夫編譯《汪兆銘言論集：日華兩文》、³波多野乾一

* 作者現為日本愛知大學中國研究科博士生、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輔助研究員。

1 〈國臺辦痛批謝長廷堪比汪精衛：「靠四處乞尾搖尾，換不來臺海和平穩定」〉（2022 年 4 月 28 日），收錄於「環球網」：<https://m.huanqiu.com/article/47mc7WkyQIS>（2023 年 7 月 11 日點閱）。

2 森田正夫，《汪兆銘》（東京：興亞文化協會，1939）。

3 中山樵夫編譯，《汪兆銘言論集：日華兩文》（東京：三省堂，1939）。

《汪兆銘を語る》、⁴ 中保与作《汪兆銘と新中央政府》、⁵ 安藤徳器編譯《汪精衛自敘伝》、⁶ 山中峯太郎《新中国の大指導者汪精衛》⁷ 等等。唯因囿於當時日本的國情，此類書幾乎均從褒揚汪兆銘的立場來進行敘述。而戰後的汪兆銘及其相關研究，現任臺灣東華大學教授許育銘則於 1999 年以一篇〈日本有關汪精衛及汪偽政權之研究現狀〉，⁸ 概述了以慶應大學教授山田辰雄和明治大學土屋光芳教授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對汪兆銘的研究概況。

再以橫向來看：日本方面對汪及其相關研究則主要涉獵於汪兆銘個人的政治思想、對日關係認識、和平運動始末，以及汪政權的經濟、外交、軍事等分野。由此可見，在千禧年前夕日本方面對於汪兆銘及其相關研究相較於其他領域雖然成果上數量有限，但日本學者卻依然可謂是孜孜矻矻，在相關領域均做出了諸多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以下本文將以許育銘的論文的結束時間節點前後，2000 年為上限，2022 年為下限，著重列舉和簡單介紹，在此時間段內日本的汪兆銘及其相關研究的主要學者及其成果，對於汪政權的相關研究則次之。希望亦可以藉此介紹促進全球相關學者尤其是中文圈學者對日本的汪研究動態的掌握和了解。

二、日本的汪兆銘相關研究

首先是日本作家上坂冬子在 1999 年出版《我が苦難の道を行く——汪兆銘の真実（上、下）》一書。⁹ 筆者認為本書最珍貴之處便是作者上坂，先後對於汪兆銘二女兒汪文彬以及大女兒汪文愷、何文傑夫婦進行的訪問。為此作者曾往來頻亟於二女兒所在的印尼以及大女

兒夫婦所在的美國。本書更是首次披露了許多關於汪兆銘言行，以及由汪氏後人所保管的相關史料和汪氏遺物。同時，何文傑不僅僅是汪兆銘的女婿更曾兼任陳壁君的秘書，並經歷了當年的種種一切，因此其個人的相關口述歷史和相關著作也十分寶貴。

爾後，何氏夫妻於 2010 年創辦了汪精衛紀念託管會，致力於整理和蒐集與汪有關相關資料。最終，汪精衛紀念託管會主編的《汪精衛與現代中國》叢書，¹⁰ 於 2019 年在臺灣付梓。為後人研究汪氏個人及相關歷史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

此外，筆者認為此書的另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則是為讀者揭示了在國家和民族主義的大纛下，這些在傳統道德上被大眾所齒冷的歷史人物的後人們，是如何被「株連九族」，以及是如何被迫進行一場「自我的流放」。透過對這些容易被忽視的邊緣化少數群體的觀察，可以讓讀者了解到在被國族主義和政治機器所無情斫傷之後，這些人的人生中遭遇到了怎樣的嬗變和顛沛流離，以及由此從心中所衍生出的那份無力感。這也恰好敦促我們重新思考：二元對立視角下的國族主義式的敘事方式，是否亟待進行再次的審視？

對於汪兆銘人物研究一直心有戚戚焉的學者，還有土屋光芳。土屋光芳如今業已從明治大學退職，究其研究生涯以汪兆銘的政治思想和民主化理論是尚。其主要關於汪兆銘的論述專著共三本，從時間線上來看是對汪兆銘的一生進行了三段式的劃分，從內容上來看，劃分每個階段的理論依據則主要在於以汪兆銘一生中的意識形態的重大嬗變為節點。這三本書分別是《汪精衛と民主化の企て》、《汪精衛と蔣汪合作政權》、「汪兆銘政權」論——比較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アプローチ考察。¹¹

4 波多野乾一，《汪兆銘を語る》（東京：青年書房，1939）。

5 中保与作，《汪兆銘と新中央政府》（東京：宮越太陽堂書房，1939）。

6 安藤徳器編譯，《汪精衛自敘伝》（東京：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1941）。

7 山中峯太郎，《新中国の大指導者汪精衛》（東京：潮文閣，1942）。

8 許育銘，〈日本有關汪精衛及汪偽政權之研究現狀〉，《抗日戰爭研究》1999.1: 172-180。

9 上坂冬子，《我が苦難の道を行く——汪兆銘の真実（上、下）》（東京：講談社，1999 年第 1 版）。

10 汪精衛著，汪精衛紀念託管會編著，《汪精衛與現代中國叢書》（全六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19）。

11 土屋光芳，《汪精衛と民主化の企て》（東京：人間の科学社，2000）、《汪精衛と蔣汪合作政權》（東京：人間の科学社，2004）、

以下將對這三本書的內容和進行大致的介紹。第一部《汪精衛と民主化の企て》的正文共分為六章，作者將本書的時間線限定於汪兆銘的日本留學時代至 1932 年蔣汪合作前。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對汪兆銘早期的無政府主義及其國家觀，以及其在歐洲時的國際政治觀和他所提出的「人類共存主義」進行了集中考察；在第四至六章則針對汪兆銘身為國民黨左派領袖時期的民主政治觀點以及他與「改組派」的關係、以及由他所提出的「約法論」進行了逐一探討。本書很大的一個亮點是，作者充分調動了外交史、比較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以及政治學等跨學科方法論，對汪兆銘的個人性格特點以及早期的政治思想進行了充分考察後，得出了汪兆銘在這個時期上是一位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盡力的政治指導者的結論。

第二部《汪精衛と蔣汪合作政權》的時間線則為 1932 年至 1938 年，即蔣汪合作的起止點。在本書中，作者主要將內容分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自孫文死後蔣汪第一次由合作到互相攻訐的歷史過程及其原因進行了探討，並對第二次蔣汪合作的歷史背景和原因進行了闡述；在第二部分則對蔣汪合作政權成立前蔣介石政權對日外交政策由「革命外交」到「不抵抗政策」的轉變過程及其成因進行了分析歸納，在此處值得一提的是，當年蔣介石實施的「革命外交」和今日中國所施行的「戰狼外交」則弔詭的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在第三部分則考察了蔣汪合作後，由蔣主導的「不抵抗政策」到汪主張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轉變原因和結果進行了探討。在綜合上述的考察以後，作者認為汪兆銘身為一個文人政治家，因為沒有自己的軍隊，所以不得不依附於蔣介石等軍人，但這也宣告了汪兆銘的任何主張均會受到軍閥的不同程度之掣肘。同時，作者又指出這種「文人」和「軍人」互相傾軋的現象是中國長久存之政治現象，並且也明末的袁崇煥為例，提示了汪兆

銘的悲慘結局。

在第三部《「汪兆銘政權」論——比較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アプローチ考察》的正文共為六章，時間線在 1938 年至 1945 年，即蔣汪合作破裂後到汪兆銘南京政府解散這段時期。在第一至第三章，主要對蔣汪合作破裂的原因以及汪兆銘由「和平運動」到「政權樹立」的原因和背景進行了分析；在第四到第六章則對汪政權的性質和具體實施的一些政策進行了考察。在本書中，作者承接上部書，指出汪兆銘在自覺自己的政治主張無法得到軍人的支持之後，因此決心打破桎梏脫離重慶，通過和日本協作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並且作者也對一直以來學界針對汪政權的性質所附會的「偽政權」、「傀儡政權」這兩個觀點的起源進行了考察。並認為這兩種立場長時間以來對汪政權的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妨礙作用。

綜上所述，由此三本專著可以基本看出，土屋光芳是將汪兆銘置於文人政治家的光譜下並輔以政治學、心理學等角度對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解構。後又以史料為依託並輔以自己的見解，對汪兆銘的個人形象及其政權性質進行了再次建構。同時也以此為基礎大膽地提出了和主流學術界所齟齬的看法。在史料和先行研究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其在書中援引了諸多史料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由此筆者認為作者的研究不僅在相關學術研究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亦在俯仰之間勾勒出來一個悲願的文人汪兆銘形象。

除此之外土屋光芳還發表了〈湯良禮はなぜ汪精衛政權に付いたか？〉、〈汪精衛と宋教仁の日本留学経験：二人の革命家の比較研究〉、〈陳公博と周仏海はなぜ汪精衛政權に参加したか？——「反共」と留学経験の關係〉等論文，¹²對汪兆銘的側近也分別進行了考察。以及〈汪精衛政權の「大亞洲主義」とその實現構想——周化人の「亜細亞連盟（汎亜連合）」〉，¹³在本

《「汪兆銘政權」論——比較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アプローチ考察》（東京：人間の科学社，2011）。

12 土屋光芳，〈湯良禮はなぜ汪精衛政權に付いたか？〉，《政經論叢》80: 3-4（2012.3）：87-125、〈汪精衛と宋教仁の日本留学経験：二人の革命家の比較研究〉，《政經論叢》81: 5-6（2013.3）：1-50、〈陳公博と周仏海はなぜ汪精衛政權に参加したか？——「反共」と留学経験の關係〉，《政經論叢》82: 5-6（2014.3）：77-136。

13 土屋光芳，〈汪精衛政權の「大亞洲主義」とその實現構想——周化人の「亜細亞連盟（汎亜連合）」〉，收入松浦正孝編著，《ア

文中對孫文和汪兆銘以及周化人各自的大亞洲主義主張進行了對比，並對相關組織亞細亞聯盟進行介紹。此外〈清末・民国期の中国人の「留学経験」と政治・社会の民主化——汪精衛と宋教仁、胡適と林語堂、湯良禮と周化人〉¹⁴則從留學生史角度考察了負笈海外的留日生和留歐美生同中國社會民主化的關係，以及各自歸國後，對中國的發展所起到的不同影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在其退職之際，更是祭出了一篇名為〈汪精衛研究文獻目錄〉的論文¹⁵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將其目前為止收集到的有關汪兆銘的書籍和論文以年代和主題進行了細緻的分類和整理，這向作業對後進的相關研究者可謂是提供了不可名狀的便利。

另一位對汪兆銘研究念茲在茲的學者是現任愛知學院大學准教授的柴田哲雄。其關於汪氏相關的單著書有兩冊，分別為《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的アプローチ》¹⁶、《汪兆銘と胡耀邦：民主化を求めた中国指導者の悲劇》¹⁷其主要論文大部分收錄於上述《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的アプローチ》一書中，其餘相關主要論文一篇〈汪兆銘伝のための覚書き〉¹⁸以下將主要對兩本專著書進行介紹。

第一本書《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的アプローチ》。全文分為三部分，共十二節。第一部分（第1-6章）主要考察了汪政權下的民眾的意識形態狀況。在各章具體則分別以東亞聯盟運動・新國民運動、汪兆銘的外交觀和政治體制觀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中國青少年團的成立和展開、汪政權下的中學校的政治教育、大東亞戰爭博覽會和日軍佔領下上海的流行歌為分別的考察對象。筆

者認為，作者在此部分最大的優點不僅僅是從國家和政府層面對相關問題進行了考察，更是進一步從民間和社會大眾的角度出發，透過眾所周知的歌手李香蘭及對當時上海的流行歌考察，進一步對汪政權的實態和社會文化對政治的作用及反作用進行了更具有深度的叩問。此外，在對汪政權下的中學校的教育這一章節中，作者更是充分發揮其田野調查的功底，對當時親歷過汪政權下教育的4名當事人進行了採訪。在這些親歷者的回憶裡，讓讀者可以在跳出被政治正確、國族主義所影響的眾聲喧嘩，以最大限度去一窺那段最為複雜、一直被遮蔽的歷史真實面相。在第二部分，作者則將視野投射到陳公博身上。從其共產黨員時期為開端，到後來成立改組派再到蔣汪合作時期，對這一路下來的陳公博政治思想的變遷進行了逐一探討。最後，又以陳公博為例，考察了汪政權的經濟政策的構想以及上海民間資本家的對其政策的接納度和最終結果。隨後在第三章，作者將著力點置於汪政權和法國維琪政權進行了比較。具體來說，則是將汪兆銘和貝當，陳公博和雅克・多里奧進行了分別的比較。作者認為汪兆銘和貝當的共同點在於兩人均主張以和平手段，保障國家利益。不同點則是貝當政府一直維持中立立場且貫徹民主政治，而汪兆銘則在後期同英美宣戰且事實上建立了以黨治國的政權。而多里奧則同陳公博經歷類似，他在早期也參與了法國共產黨的創辦，爾後卻成為了法西斯主義者。但同時作者亦指出，兩人雖同為佔領軍服務，但陳公博一直以消極態度面對日方，而多里奧則大相徑庭，積極配合德方。綜上所述，一言以蔽之，作者可謂是從多角度、多分野的面向，深入探討了汪政權治下的政府和民間、理想和現實、實像和虛像之間的碰撞。

第二本書《汪兆銘と胡耀邦：民主化を求めた中国

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13），頁424-446。

14 土屋光芳，〈清末・民国期の中国人の「留学経験」と政治・社会の民主化——汪精衛と宋教仁、胡適と林語堂、湯良禮と周化人〉，收入高田幸男編著，《戦前期アジア留学生と明治大学》（東京：東方書店，2019），頁45-79。

15 土屋光芳，〈汪精衛研究文獻目錄〉，《政経論叢》90: 3-4（2022.3）：239-326。

16 柴田哲雄，《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的アプローチ》（東京：成文堂，2009）。

17 柴田哲雄，《汪兆銘と胡耀邦：民主化を求めた中国指導者の悲劇》（東京：彩流社，2019）。

18 柴田哲雄，〈汪兆銘伝のための覚書き〉，《愛知學院大學紀要》66: 2-3（2019.3）：13-63。

指導者の悲劇》，作者巧妙地將兩個在歷史上看似毫無交集的曾經的中國領導人置於同一歷史的光譜下進行了比較。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汪兆銘的一生進行了概說；第二部分對胡耀邦的一生進行了概述；第三部分則命名為「從救國到救黨」。透過前兩章我們可以知道，雖然汪兆銘和胡耀邦沒有歷史交集，但是兩人均曾身處列寧式的專制政黨，且都曾在黨中身處高位。但兩人卻又對民主主義和民主化抱有強烈的執念，同時此二人亦曾所處那鑿鼓揭天動地而來的特殊歷史環境之下，外加其所屬政黨逼仄的性質，這一切種種揉雜在一起，則已然揭示了二人共同的慘澹命運。除此之外，兩人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主張友日的態度，這也成為了民族主義者攻訐他們的痛點。本書的第三部分，在本章中作者僅用了一節探討汪兆銘和民主化的關係，更多地則是著墨於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化的糾葛，從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時代到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再到今日的習近平時代。由於此書的定位是給大眾看的一般書，為了淺顯易懂所以對於許多地方的論述點到為止，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從中管中窺豹，了解到從中國近代以來，總有一部分人明明知曉道阻且長，但他們對於自由與民主的思辨，從未停下腳步，莫此為甚。

接下來要介紹的同儕是現任津田塾大學准教授的關智英。究其主要研究成果，迄今為止其著有單冊：《対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¹⁹和多篇論文，由於其多篇論文均收錄於其上述單著中，在後續將對其單著進行介紹，所以在此僅列出未被納入之相關論文。與汪及其政權相關論文有：〈日本敗戦後、外務省で翻訳された汪精衛政権刊行物——許錫慶編著『中国革命之理論と史実』の周辺〉、〈占領地における中国第三勢力——中国社会党・中国国家社会党を中

心に〉、〈汪精衛の日本留学と陽明学——その活動の背景〉。²⁰現在主要對〈汪精衛の日本留学と陽明学——その活動の背景〉、〈占領地における中国第三勢力——中国社会党・中国国家社会党を中心に〉這兩篇論文進行介紹。〈汪精衛の日本留学と陽明学——その活動の背景〉一文主要考察了負笈日本時期的汪兆銘。其在日本法政大學求學時，在從學校裡接受西式民主法治教育的同時，在生活亦激起了對陽明學和對西鄉隆盛同勝海舟的私淑。而這和汪兆銘在幼年時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其內容有相當大的比重來源於王陽明的《傳習錄》不無關係。也因此，此時期的汪兆銘進一步加深了對已經本土化，即日本化的陽明學的鑽研和理解。在文章的最後作者也提出汪兆銘對日本化陽明學的接納，也成為了日後其與日本合作的重要思想背景之一。

〈占領地における中国第三勢力——中国社会党・中国国家社会党を中心に〉，在本文中作者主要著目於和國共兩黨同時期成立，但卻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第三黨——中國青年黨以及日後從中國青年黨分化出來的中國國家社會黨和中國社會黨及其創始人江亢虎身上。在文中作者對上述黨派及個人的歷史和具體活動進行了詳細介紹，讓後人知道在那個變遷的鼎革之際，除了國共兩黨這兩位主角之外，仍有第三黨、第四黨，乃至更多的黨派和個人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以及自己心中的信仰，力行之之所趨，無遠弗屆之事。

《対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一書，是作者在其向東京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之上，又添加了四篇文章從而成書出版。此書可謂近年來日本相關學界的又一扛鼎之作，且得到了很高的評價。此書共分為三章，第一章以中日戰爭勃發前後為時間點，考察了存在於各地方的政治勢力及相關構想。主

19 關智英，《対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9）。

20 關智英，〈日本敗戦後、外務省で翻訳された汪精衛政権刊行物——許錫慶編著『中国革命之理論と史実』の周辺〉，收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歴史系検討會論文集》（東京：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22），頁 1-16、〈汪精衛政権の「大亞洲主義」とその実現構想——周化人の「亜細亞連盟（汎亞連合）」〉，收入川島真編著，《日中戦争研究の現在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記憶・権力・価値歴史と歴史認識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22），頁 239-280、〈汪精衛の日本留学と陽明学——その活動の背景〉，收入楊繼開編著，《「明治日本と革命中国」の思想史——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相互還流》（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21），頁 322-339。

要對象有：殷汝耕和池宗墨治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臺灣淡江大學創始人之一張鳴曾經提出的「五族解放」、「大漢國」理論、日本曾所希冀推動的吳佩孚擁立工作和日支民族會議以及上海大道政府的理論創始人西村展藏及首任市長蘇錫文。第二章則主要考察了日中戰爭勃發後，在日本支持下所成立的中國諸地方政權的實態。具體內容為：維新政府領導層的時局觀、汪政權下的興亞建國運動及其創始人袁殊、汪政權的憲政實施構想以及同盟會的元老伍澄宇。第三章的焦點則在日美開戰後到日本戰敗後這段時期，具體考察為日美開戰後佔領區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曾任共產黨員和抗日救國會成員的日本人吉田東祐的立場、效命汪政權的著名作家胡蘭成戰後在日本的動向、戰後日本為了救助那些曾因協力過日本，所以在戰後導致生活困蹇乃至自殺的中國人而設立的「善鄰友好協會」歷史經緯。誠如上所示，透過其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此書雖然沒有將筆鋒放在汪兆銘個人身上，但是作者卻有意識的透過對疇昔汪政權同時代的相關政黨、政治實體抑或相關個人的解析，探尋其與汪政權和汪兆銘個人理念的外異和相似。另一方面，本書中所關注到的人物多為被歷史湮沒無聞之輩，但其歷史過往卻有著極高的歷史挖掘價值，並且又都指涉日本、協力者和相關政治構想。由此可見作者旨在建構一個龐大、多彩且真實的「對日協力者」網絡。並在打破以往日本學界將主要研究視野聚焦在國共雙方、汪政權上的單線性軌跡的同時，也展示出了一個新的歷史研究的面向。

在本節最後，介紹的論文是沖繩國際大學退任教授黑澤亞里子的論文〈田村俊子と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の三編の詩をめぐって〉。²¹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介紹了當時日本作家田村俊子於1939年採訪汪兆銘，並獲贈詩集《雙照樓詩詞藁》的由緒，並對《雙照樓詩詞藁》做了簡短介紹，並以日語對詩詞藁中的「感懷」、

「述懷」、「海上」這三首詩的內容及其大意進行了翻譯。值得一提的是，此篇論文是筆者於日本學界近二十年中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篇對於《雙照樓詩詞藁》有所關注的論文。筆者認為，對於汪兆銘的研究如今均幾近集中於其政治思想，但汪兆銘除了是政治家以外更是一位舊體詩人，現在世俗多認為汪兆銘在晚年背棄了其早年的理念，但筆者認為此詩集的所涵蓋的時間段幾乎涵蓋其一生，而對於汪兆銘這種接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的文人政治家，尤其是在其晚年名聲已然虧仄的境況下，也許透過舊體詩來紓解和表達其生命中的「悲心」同「憤心」也不無可能。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曾以胡蘭成為例寫出一篇〈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背後的詩學政治〉，²² 其高足臺灣大學的高嘉謙教授也撰文〈風雅・詩教・政治抒情：論汪政權、龍榆生與《同聲月刊》〉。²³ 由此可見，倘若可以從詩詞、抒情的層面入手，對於汪兆銘的研究應該可以走得更遠、更深邃。

但日本學界對於以文學角度和《雙照樓詩詞藁》為切入點的研究幾乎可以斷言仍為空白。對於此點筆者認為大概有兩點原因：1. 如今日本文科的研究整體而言業已呈現青黃不接的局面，如今日本老一輩的學者已經在逐漸謝幕。而歷史和文學這種著重於厚積薄發，並且投入比和回報比相差過大的學科，使得日本年青人在大學畢業後很少選擇在相關領域繼續深造。而且對於日本人來說，學習東洋史或中國文學則是又多了一層酷烈的試煉，因此鮮有人嘗試挑戰。2. 由於汪兆銘從小接受的便是中國舊學的訓練，因此其文學和歷史功底均十分深厚，這一點從其在詩中的大量用典則有著清晰明瞭的體現。因此即便是對於日本的教授級別的學者來說，對於其詩詞的解讀也實非易事。

另外根據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於2020年提出的《科學研究費助成事業研究成果報告書》²⁴ 我們可以得知其於2015-2019之間在進行一項名為「日中關係史におけ

21 黑澤亞里子，〈田村俊子と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の三編の詩をめぐって〉，《沖繩國際大學日本語日本文學》22: 1 (2017): 125-132。

22 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北京：三聯書店，2019），頁202-242。

23 高嘉謙，〈風雅・詩教・政治抒情：論汪政權、龍榆生與《同聲月刊》〉，《中山人文學報》38 (2015.1): 61-88。

24 劉傑，〈日中關係史における「汪兆銘研究」の構築〉，全文網址：<http://www.kaken.nii.ac.jp/file/KAKENHI-PROJECT-15K02874/>

る「汪兆銘研究」の構築」的課題研究。根據報告內容可知其主要目的在於 1. 將目前為止散落在日本、臺灣等地的汪兆銘相關史料進行蒐集、整理統合、翻譯、公開。在此後（即 2020 年）的 1-2 年內公開。2. 以現有史料為基礎，以客觀角度進行汪兆銘傳記的撰寫，最遲將於 2022 年度內公開。截至目前（2023 年 6 月）根據筆者調查，上述兩項目的似乎並沒有達成，考慮應是疫情原因阻礙了作業進度。

三、日本的汪政權相關研究

關於此點除上述已然列舉之研究外，其相關研究成果大概分為以下幾個分野。

（一）和平研究方面

此部分主要成果有今井貞夫專著《幻の日中平和工作——軍人今井武夫の生涯》、²⁵ 今井武夫著，今井貞夫、高橋久志監修，《日中平和工作——回想と証言 1937-1947》、²⁶ 現任愛知學院大學副教授廣中一成的專著《日中平和工作の記録：今井武夫と汪兆銘・蔣介石》、²⁷ 論文〈汪兆銘工作、桐工作——和平に奔走し

た陸軍軍人・今井武夫の信念〉、²⁸ 曾任日本駐華書記官、京都地檢檢事、曾任早稻田大學、日本大學教授太田茂的專著《日中平和工作秘史——繆斌工作は真実だった》。²⁹

（二）概述方面

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小林英夫專著《日中戦争と汪兆銘》、³⁰ 小林英夫、林道生共著《日中戦争史論——汪精衛政權と中国占領地》。³¹ 早稻田大學教授劉傑論文〈汪兆銘政權論〉。³²

（三）內政方面

劉傑專著《漢奸裁判》³³ 以及專修大學助教小笠原強的專著《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汪精衛政權の政策展開と実態——水利政策の展開を中心に》、³⁴ 論文〈汪精衛政權行政院からみた政權の実態について——機構・人事面から〉、³⁵ 〈汪精衛政權下の日本人顧問：顧問の配置とその影響〉、³⁶ 日本大學講師掘井弘一郎專著《汪兆銘政權と新国民運動——動員される民衆》、³⁷ 櫻美林大學准教授大澤肇論文〈汪兆銘南京国民政府下における学校教育の展開〉。³⁸

15K02874seika.pdf (2023/6/9 點閱)。

25 今井貞夫，《幻の日中平和工作 軍人今井武夫の生涯》（東京：中央公論事業出版，2007）。

26 今井武夫著，今井貞夫、高橋久志監修，《日中平和工作——回想と証言 1937-1947》（東京：みすず書房，2009）。

27 廣中一成，《日中平和工作の記録：今井武夫と汪兆銘・蔣介石》（東京：彩流社，2013）。

28 廣中一成，〈汪兆銘工作、桐工作——和平に奔走した陸軍軍人・今井武夫の信念〉，收入川島真編著，《満洲国と日中戦争の真実》（東京：php 研究所，2022），頁 177-188。

29 太田茂，《日中平和工作秘史——繆斌工作は真実だった》（東京：芙蓉書房，2022）。

30 小林英夫，《日中戦争と汪兆銘》（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31 小林英夫、林道生，《日中戦争史論——汪精衛政權と中国占領地》（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5）。

32 劉傑，〈汪兆銘政權論〉，收入岩波講座，《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7》（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249-284。

33 劉傑，《漢奸裁判》，（東京：中公新書，2000）。

34 小笠原強，《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汪精衛政權の政策展開と実態——水利政策の展開を中心に》（東京：專修大學出版局，2014）。

35 小笠原強，〈汪精衛政權行政院からみた政權の実態について——機構・人事面から〉，《專修史學》38（2005.3）：104-136。

36 小笠原強，〈汪精衛政權下の日本人顧問：顧問の配置とその影響〉，《專修史學》59（2015.11）：1-40。

37 掘井弘一郎，《汪兆銘政權と新国民運動——動員される民衆》（東京：創土社，2011）。

38 大澤肇，〈汪兆銘南京国民政府下における学校教育の展開〉，《東洋史研究》77: 4（2019.3）：108-136。

(四) 外交方面

戶部良一論文〈汪兆銘のハノイ脱出をめぐつて——関係者の回想録と外務省記録〉,³⁹ 愛知大學退任教授三好章論文〈維新政府と汪兆銘政權の留学生政策〉,⁴⁰ 〈汪兆銘の滿洲国訪問一九四二〉,⁴¹ 愛知學院大學名譽教授菊池一隆專著《戦争と華僑——日本・国民政府公館・傀儡政權・華僑間の政治力学》,⁴² 《戦争と華僑統編——中国国民政府・汪精衛政權の華僑行政と南洋・北米》,⁴³ 東洋文庫研究員相原佳之等人所編《東洋文庫藏汪精衛政權駐日大使館文書目錄》,⁴⁴ 駒澤大學教授石井仁和熊本史雄的共著論文〈汪兆銘から東條英機に贈られた出師表の拓本〉。⁴⁵

(五) 軍事方面

三好章專著《「清郷日報」記事目錄》,⁴⁶ 菊池一隆專著《中国抗日軍事史 1937-1945》,⁴⁷ 《中国国民党特務と抗日戦争——「C・C」系・「藍衣社」・三民主義青年団》。⁴⁸

由於諸多汪政權研究成果的分散性，因此不及備載只能掛一漏萬，於上述僅列舉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論文。望讀者諒之。

四、結語

透過上述所列舉的日本學者針對汪兆銘及其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千禧年以後日本學者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前人的先行研究基礎上，結合諸多的跨學科知識，以此做出了進一步的深化和探索，並取得了許多具有學術價值的成果。同時，在研究視野上，日本學者也在不斷朝著多樣化的方向進行探索和擴張。尤其是在汪兆銘個人的陽明學思想，以及在文學活動等諸多方面，均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最後，像土屋光芳和劉傑等學者，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也一直宵衣旰食的對汪兆銘及其相關研究的歷史資料進行系統性歸納和整理。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這些日本學者所做進行的相關作業，在為後來的研究學者指出未來研究道路的同時，亦為學術研究的多樣性和還原歷史真相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克羅齊在其著作《歷史的理論與實踐》(*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中，曾提出自己的一個史學立場：「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此，筆者認為對於汪兆銘的研究，不僅僅是對於所過去發生之事的探索和總結，對於當下時刻處於世界大戰邊緣的世界來說亦具有其現實層面的參考意義。

最後，諸葛亮在其〈後出師表〉中曰：「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也」。筆者認為對於歷史罡風中之汪兆銘，亦均應做如是觀。

39 戶部良一，〈汪兆銘のハノイ脱出をめぐつて〉，《外交史料館報》19（2005）：117-131。

40 三好章，〈維新政府と汪兆銘政權の留学生政策〉，《神奈川大學人文學研究所報》39（2006）：33-45。

41 三好章，〈汪兆銘の滿洲国訪問一九四二〉，收入馬場毅編著，《多角的視点から見た日中戦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の相克》（福岡：集広舎，2015），頁267-294。

42 菊池一隆，《戦争と華僑——日本・国民政府公館・傀儡政權・華僑間の政治力学》（東京：汲古書院，2011）。

43 菊池一隆，《戦争と華僑統編——中国国民政府・汪精衛政權の華僑行政と南洋・北米》（東京：汲古書院，2018）。

44 相原佳之、尾形洋一、平野健一編，《汪精衛政權駐日大使館文書目錄》（東京：東洋文庫，2016）。

45 石井仁、熊本史雄，〈汪兆銘から東條英機に贈られた出師表の拓本〉，《駒大史学》91（2018.12）：141-172。

46 三好章，《「清郷日報」記事目錄》（東京：中国書店，2005）。

47 菊池一隆，《中国抗日軍事史 1937-1945》（東京：有志舎，2009）。

48 菊池一隆，《中国国民党特務と抗日戦争——「C・C」系・「藍衣社」・三民主義青年団》（東京：汲古書院，2022）。